

冯亦代◎著

绿的痴迷

下

青年读本

黄青道题



大众文艺出版社

青年读本

绿的痴迷

冯亦代 著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哭 姚 平

成年后我很少流泪，倒不是因为我是个无母的孤儿，眼泪早已在孩提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流尽了；多半是由于历尽人世艰辛，感情变得粗糙，便对悲欢离合，显得那么漠然。这次在姚平的追悼会上，听他女儿珠珠哽咽地念着《祭父文》时，却不禁悲从中来，老泪纵横，不能自己。

我流泪为的是悼念这位在平凡的生活里，给党做了许多工作，却含冤二十年，过早离开人世的朋友。他死在 1961 年，只有四十五岁，正是风花岁月，有所作为之年。如果他不在冤屈中死去，又能为党为人民做多少工作呢？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工作也好！大海之水来自百川千流，百川千流来自滴滴的水珠。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前人所梦想不到的新世界，把一个人比之为一滴水珠，海洋不能讪笑它，因为没有它，海洋就不成其为海洋了。当然，在浩渺的大海里，一滴水珠算不上什么，但海洋毕竟还是离不开它。我们设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能离开千百万人的劳动吗？正是姚平那样的同志，他们没有丰功伟绩可言，但在建造这未来美好世界的工程中，我们却不能忘掉他们在默默的劳动中所添上的一块瓦，砌上的一方砖。

我认识姚平的时候很晚，是在 1945 年抗战结束之后，但早在抗战末期，我就知道他的名字，那时他在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新中国剧社是大后方有数的进步话剧团体之一，他们在进步文化界特别是欧阳予倩先生的支持下，在桂林举办

过轰轰烈烈的戏剧节，曾经使当地反动派的城狐社鼠之辈切齿痛恨。可是他们摧毁不了这个团体，因为这个剧社是有坚强的地下党领导的，而且是为桂林人民所爱护的。因此，即使在1944年冬，国民党军在日本帝国军队压力下，不战自溃，造成惨绝人寰的湘桂大撤退时，这个剧社还是历尽千辛万苦，转移到昆明，在半饥半饱的情况下，重新在舞台上为宣传中华民族抗战到底，出一分力，发一分光。这些艰苦卓绝的同志中间，就有姚平在。

1946年冬在上海，凤子和叶以群筹划复刊在桂林出版过的《人世间》。关于这个刊物的来龙去脉，凤子已在《新文学史料》第三期上发表了《〈人世间〉的前前后后》一文，我就不再多说。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姚平同志。他那时还年轻，瘦瘦的身材，苍白的尖削的面颊，显出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使我特别感动的，则是他的干劲，只要有什么要跑腿的事，他一开口就是“我去”。凤子在文章里说他任《人世间》的编辑秘书，这只是个“好听”的名字，事实上他是个“跑腿”，通讯联络、财会等工作是坐着做的，但催稿、送审、发稿、校对、发行刊物、收广告费等等杂差，就是姚平去跑出来的。

他每月的收入只有菲薄的车马费法币二十元，以后是按比例换了金圆券，可是物价却一日数涨。有时我问他要不要钱用。他总是笑笑说：“够用，够用，我有办法！”他有什么办法呢？他那时上有老母，下有妻儿，要养家活口，但他总是那样乐呵呵的笑容满面，似乎他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令人愤慨的是“三反”时居然有人来调查，问姚平在《人世间》时有没有挪用公款。我回答说《人世间》根本没有公款，只有私款。我们是靠每期的广告和发行收入的周转来维持的。

自从以群、凤子、丁聪、马国亮相继离沪后，杂志之没有停刊，全靠姚平一个人支持了下来。1948年三四月间，姚平和我还设法编了第14、15期合刊交给太平洋印刷公司印刷。我曾经看到过样本，但以后是否发行，我就记不得了。那时刊物的稿源和财源都有困难，我的意思是等上海解放了再出版。可是姚平的想法和我不一样，我计算了一下存稿还可以应付两期，建议出版合刊，至于印刷费则要我去向印刷公司关说一下暂时缓付，我同意了。那时上海在军统特务毛森（兼上海市的警察局长）的白色恐怖下，定期出版的进步报刊已经封禁殆尽，由于《人世间》这时已经成为不定期出版的刊物，而且没有一个编辑部可以查封，所以幸逃罗网。姚平那时的意图，就是在于要向反动派显示一下：“这里还有一本你封不了的杂志存在！”这真是一个革命斗士的不屈精神。这种无畏的境界是我所万万不及的。追悼会悼词中说：“和他共同工作过的同志，都忘不了他不求名利，不顾安危，总是默默地承担政治压力，积极去解决困难和不辞劳苦终日奔波的工作精神。”这句话绝非溢美之辞。他的这种行动，是这样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

我知道他的遭遇已在1960年时，但我总希望他能“挺”得过来。“四人帮”倒台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噩耗。去年关于“改正”的政策公布，我想他的错案能够及早得到解决，但还是阻力横生，一直到最近才开了追悼会。究竟是为了什么才使一位好同志含冤二十年，过早地离弃人世，过迟地“改正”呢？

一位和他一同劳动过的同志提及姚平的情况，还意犹难平——沉重的心情，无边的岁月，眼看他一天天消瘦下去，但他没有一句怨言，只要有什么活路要干，他还是乐呵呵地

说“我去”，一直到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从来在追忆中，对于死者，没有一个不是被视为“好同志”的。但为时已经迟了，他只能是纸上和嘴上的“好同志”，再不能成为生活中的“好同志”了！我有时天真地想，如果在死者生时就能被认为是个好同志，而不是在他死后“追封”他为好同志，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更美好的。

1979年11月

第四次文代会期间

悼陈翰伯同志

噩耗传来，翰伯同志竟撒下我们撒手西去了。他悄悄地去正如他悄悄地来，然而他留在世上的业绩却是永远磨灭不掉的。可是也得感叹于人世的无常，因为就在8月25日他去世的当天上午，他还出席了《读书》服务日介绍浙江文艺出版社《学术小品丛书》的座谈会。他对于这套丛书的设计很是欣赏，他说“现在出版界正面临着一个困难时期，有这样的丛书出版，是会给出版界以启发的”。那天他说话不多，但是从老人的眼光里，可以看到他对为之辛勤一生的文化和出版事业的忧虑。我问到他的病体，他说最近只是觉得乏力，我劝他要珍摄，他默默地看了我一眼，神情似乎比前一星期出席《读书》编委会时显得低沉。那天他还发表了不少意见，但是除了我们的对话外，他只是默默地坐在那里。我心里一阵凄楚，这哪里是当年的翰伯！他老了，他病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当天晚上就离去了。

半个多世纪来，我曾经两次和他在一块工作。第一次在1946年上海的《联合晚报》，第二次则是1978年的《读书》杂志，这也是我生命中的两个顶点。1946年秋天，他和冯宾符来找我，要我去晚报编副刊《夕拾》，从此我们是天天见面，他编头版写社论，报上“天窗”之多，可以看到他笔下的斗争，1947年的愚人节他还和反动派开了一个玩笑，以美联社的名义写了一段假新闻刊在头条，搞得反动派晕头转向，这说明他的机智。除了编《联合晚报》，他还为其他报刊写国

际论文，“梅碧华”这个笔名，时常流传在青年读者的口里。如果说一位作家也是培育人才的，那末翰伯曾经抚育了整整一代的人。那时《联合晚报》是一支文化轻骑兵，为反动派所头痛、所扼杀。但这不是无望的斗争，它的被扼杀正说明这支轻骑兵的辉煌战绩。

我在《夕拾》上写《灯下随笔》，这还是我第一次写这样形式的杂文，他总是鼓励我。我们常常在报纸付印后，一边喝酒剥花生，一边倾谈国家大事、反动派的困境和中华民族新生的希望。谈话之间，报纸言论的方针也就此形成了；我便照此方针写我的《灯下随笔》。同时，这样的谈话指导了幼稚的我，使我形成并巩固一己的世界观。所以翰伯虽以朋友视我，我却视之为师，因为他引导我走上进步的道路。人生得一知己并非易事，翰伯确是我的知己，我在今日之略有所成，受惠于翰伯者多多矣。

1988年9月5日

悼阳翰老

凤姐来电话说阳翰老故世了，我为之一怔。前些日子听说翰老已神志昏迷了多日，心知不妙，但没有想到竟会如此迅速。一代宗师离开人世，令我神伤。

我在读书时就知道左翼作家中，有位名阳翰笙的领导人，但和他首次见面时，已在1938年夏天了。那时他代表武汉各界抗敌协会来香港委托中央信托局向海外购买运输卡车、药品和外文书刊等，我正在该局购料处工作，他们是由我接待的，不时见面就成了熟人，和他同来的还有电影导演程步高。

不久他要回武汉去了，我便到他们住的西环海边一家旅店里去给他们送行。他们住在一家并不起眼的小旅店里，在一大层统楼里间隔为十几个小房间，有如鸽笼。他们住的房间正处大屋的中央，两人局促斗室，十分湫隘而且空气郁闷。我找到他们的住房，已是汗流浹背了。我问翰老为什么不找一个较好的旅馆，他笑笑说，这儿房金便宜，又不久留，就暂时落脚了；旅费无多，能省即省。他说话时十分自然，好像理当如此。不由我不肃然起敬，钦佩他的俭朴作风。以后在重庆来往更多了，便知俭朴是他的美德。那时他在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平时从机关所在地赖家桥进城，经常挤公共汽车，加上步行。

我是1941年初到的重庆，一到就去找他。他欣然如见老友。他说当前国民党反共又起高潮，要我言行谨慎，有事他随时会通知。果然不出数日就发生了皖南事变。是年冬，他

和应云卫、陈白尘等组织中华剧艺社，他又特别关照我，要我选择英美剧本，以便万一剧本送审不获通过的，有戏可以上演。太平洋事变日军占领香港，他知道我有妻儿陷身虎口，特别招了我去安慰有加，并告诉我党已进行营救撤退，要我安心等待。他写成话剧《天国春秋》上演，以古讽今，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暴行，使重庆市民精神为之一振。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又组织上海联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坚持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不但是进步力量的领导人，还是一位年轻人的老大哥，我一直尊他为老师。他编写电影《三毛流浪记》脚本，写稿时多方听取不同意见，使剧本更趋完善。他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为青年人立下了楷模，尤其他诚恳朴实的待人接物，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解放后，他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我在国际新闻局工作，和他常有联系，每次有事到中南海，他总亲切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并要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政策。他说外事工作的政策性极强，不能出错，不能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

1950年冬全国政协组织知识分子下乡土改，我参加了第十九团。团长是阳翰老，我任副秘书长及小组组长之一。这团大部是科学院的专家和北大、辅仁的师生，翰老随时检查工作，怕我们有差错，手把手地教会我进行工作的方法及撰写报告、总结等文件。我当时参加工作不过一年多，对这些都是生疏的，但有了翰老的教导，使我少犯错误，至今想来我还是衷心感激他的。我忘不了他待人以诚、律己以严的操守。

“大革文化命”时，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斗争夏衍和翰老及

田汉的大会，我看到他们受尽屈辱为之下泪，因为我想不通多少年工作的老党员竟会招到如此强暴的对待。我不相信那些对于他们的指控，一直到自己也成了阶下囚之后，才开始懂得了政治斗争的残酷和以势压人的霸道。“四人帮”倒台之后，翰老被释并恢复了名誉，我没有听到他有一句怨言，显示了他对党的忠诚。

翰老离开我们走了，走得如此匆促，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对我的教导和他为人的风范。

1993年6月17日 七重天

悼
阳
翰
老

情系中国的韩素音

在我国，韩素音的大名，无论党政要人，文化学术界人士，甚至是不幸的残疾人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而且一提起她，也没有人不生敬佩之心。她每年在春秋二季回国。每次来报纸上总要刊出有关她行踪的消息，而蒙她眷顾的人，也莫不以一见她为幸。她每次回国也一定走访这些老友新朋们，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残疾青年，除非时间上实在分身不堪，她不会忘掉任何一个朋友。即使见不了面，她也要致以衷心的存问。令我十分感动的，倒不是只是为了她在海外做了许多有益祖国的工作，而是她对我国前途、文化事业、以及残疾青年生活的关怀。

韩素音现在虽拿的是英国护照，但她始终没有忘掉她那么多难而又前途光明的祖国。她处处以祖国的辩护人自居，曾经因为保卫祖国的荣誉和令名而在海外多次受到反华分子的围攻，但是不以此而低头，反而更坚定了爱祖国的赤诚。她曾经说过，除了写小说之外，她要利用每一个机会，为宣传祖国而出力。有一年我们在纽约相遇，她正忙着要到美国南方各地旅行演讲。那时国内“四人帮”刚倒台不久，别有用心的所谓“中国通”却写书立说，攻击中国，蒙蔽了许多不知详情的善良人士。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她举行了十多次演讲和答辩，使中国的真情，得以到达美国人民的心间。这样的生活，她不但在美国如此，她在西欧和东南亚亦复如此。她维护和宣传祖国的旅行演讲先后共达四五千次，终年风尘

仆仆，到处奔走，她不以为苦，反而引以为乐，为的是求她爱国心之所安。

她说那些别有用心人之制造谣言，目的在制造反华舆论，从而孤立新生的中国，不利于中国的建设；因此必须在这些人不成气候时，予以各个击破，消除隐患。她在这些强敌面前，是以勇士的面目出现的，虽然这些所谓“中国通”说尽了谎言，但终于抹不掉韩素音的正言谏论，而败下阵来。

我熟识韩素音都快十多年了，我所见到的她，总是忙忙碌碌，废寝忘食；她要向祖国的朋友们倾尽积蓄，也抱着一腔的热诚，做一个祖国的诤友。她不但对国际上对华态度了如指掌，甚至国内人行道不设坡道，不便于坐轮椅的残疾人这样的小事，也注意到了。她对于残疾人的存问和关注，温暖了残疾人的心，使他们从无望的心境中，树下坚定的信心。她为他们捐款就医，她为他们购买轮椅代步，这些在有的人看来是小事一桩，但韩素音并不轻视，她鼓励了多少个残疾人有勇气走上了艰难的人生道路。

对残疾人她尽了她的力量，对祖国的文化交流事业，她也永远铭记在心，无时或释。为了鼓励中国的中青年从事翻译工作，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她创立了两个年奖，一个是作家协会有她创始的“彩虹奖”，每年颁发一次，得奖人的年龄限在四十五岁以下，是专门奖给从事文学翻译的中青年的。另一个是委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主持的“韩素音青年翻译奖”，也是每年发奖一次，给那些有志于翻译工作的年轻人。最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她设立的“韩素音中国与西方交流基金会”，专事培养中国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中青年，由她出资送往欧美各国深造。她对于这份工作十分重视，对申请人亲自考核语言水平，对语言听说能力较差的，便鼓励他们再补

习一年应试。这样受惠的优秀中青年，多年来已经不少了。她和丈夫陆文星先生又委托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举办“韩素音陆文星中印友谊文学奖”，每隔一二年颁奖一次，给印度文学研究及做译作有建树的学者们，以促进中国学者对印度文学及古典著作的研究及翻译。她又与北大第一分校及燕京大学校友会合办 Epic 语言中心，培训初高级使用英语的人员。其他，她还和陆文星捐款家乡四川的水灾难民和儿童教育事业等等。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特别对陆文星颁给“友好使者奖”，以酬谢陆文星和韩素音对中国文化交流事业的重大贡献。

韩素音于 1916 年在河南信阳诞生，原名周光瑚，1932 年以周月宾的学名，入燕京大学读医预科；韩素音是她于 1938 年发表处女作《目的地重庆》用的笔名，从此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终而成为一位名扬世界各地的女作家。她的父亲周炜字映彤，是个出身于四川富商家庭的世家子弟，也是中国早期派赴欧洲读书的留学生之一。他于 1902 年留学比利时，学铁路工程，以一次偶然的邂逅，爱上了比利时国防大臣的侄女玛格里达·丹尼斯，遭到笃信天主教的丹尼斯家反对，不得已相偕私奔。韩素音一生倔强和不向困难低头的性格，可说是来自父母的遗传。

韩素音既是个欧亚混血儿，她在青少年时候不免备受那些所谓正统白种人的蔑视和欺凌；她为之痛心疾首，却又无法逃脱她的际遇，她只有努力奋斗，用事实来证明她并不是一个平凡之辈。因兄弟姐妹众多，家里无法负担学费，因此阻碍她自小要当医生的志愿。她不得不在少年时期入北京协和医院做打字员，一面积蓄学费，一面自学，终于考进了燕京大学医预科读书。1935 年秋，她获得奖学金到比利时布鲁

塞尔自由大学继续她的学业。可是到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军兴，韩素音在比闻讯义愤填膺。“中国，中国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气息，我的生命！”她那埋藏在灵魂深处的爱国心，突然爆发而不能自己。1938年她通过大学的学位考试，她的爱国赤诚无法抑制了，既到处演讲，又随时写成文字在报刊上发表，宣传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使欧洲人民得知中国国土被占的惨相。她放弃了赖以继续学业的奖学金，和做医生的前途，辞别了爱她的外祖父和挚友，只身回到中国，从此写下了她生命的又一篇章。她写道：“回去，回去，回到我的中国去！现在我知道，没有什么别的爱比这种爱的力量更为强大。”

她回到祖国，却没有能立即投入神圣的抗战事业，她在婚事上受到感情的欺骗；她在人生的海洋中不懈挣扎，终于在文学写作上找到了报国之道。1942年她写的《目的地重庆》一书先后在英美出版，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事变，英美读者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成了畅销书。而使读此书者知道东亚抗日战争对于世界大局的意义。1942年韩素音重返英国伦敦，入伦敦大学习医，1948年她取得行医的资格。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她向往于新生的祖国，途经香港回到成都探亲。50年代即在香港、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行医，此后即以写作蜚声国际文坛。1956年，她与印度建筑工程师陆文星结婚，1975年在瑞士洛桑卜居。

韩素音不但人生际遇丰富，而且她的文字语言又有她一己的独特风格，读者欣赏的不止是行文构思中东方人的光辉，更多的是她混合中西儿女细致情意的诗样语言。她不止是个一般小说或传记的作家，她是个文体家。她写的长篇小说有《爱情至上》（1952）、《雨水是我的饮料》（1956）、《青山青》

(1958)、《投下的阴影》与《冬天的爱情》(1962)、《四面玲珑》(1963)、《盼到黎明》(1983)、《迷人的城市》(1985)等。自传有《伤残的树》(1965)、《凋谢的花朵》(1966)、《无鸟的夏天》(1968)、《丰收》(1978)及《我家有两个门》(1980)。传记有《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1893—1953》及《风满楼：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1949—1975》，其他《拉萨——开放的城市》(1975)，《二〇〇一年的中国》及《今日亚洲》等。她自传前三部有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节译本，小说《青山青》、《盼到黎明》及《迷人的城市》亦有中文译本，但这些书都是出版后一销而空，不可复得。今年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将出版韩素音自传五卷全译本——《残树》、《风花》、《寂夏》、《吾宅双门》及《再生凤凰》不日即可问世。

韩素音现在虽以英籍作家闻名，但是她的内心里期期难以接受，始终以中国为她的祖国，她曾经对友人说过，她是中国人，她的血里一半是中国血统。许多人老来以寻不到根而苦恼，但是她却没有这种困惑；因为她的亲人都在中国。将来有一天她老了，她就回到这个根上来，享她的天年。她又说她要卜居香港，这样她可以和家乡离得更近一点。她可以听到家乡的声音，也可嗅到家乡的芳香。

1991年2月25日

与费正清的最后一面

1980年，我与卞之琳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邀请，有访美之行，我到剑桥去看了老友费正清教授。

在约定的时间，刘年玲把我和卞之琳送到有名的温忒罗普街41号。这里曾经是老老少少中国学家经常来临的地方，因为这是美国研究中国学的创始人之一费正清多年居住的所在，来这里谒见顶礼的除了美国的年轻学人外，多数是那些如今已花白头发的老一辈中国通，不但有美国的，还有国际的知名学者。我们去时，费正清早已退休，而且又是事前约好的，所以他摒绝了所有要来和他见面的旧友新知，为我们留着久别重逢可以长谈的时间，所以门庭显得有些冷清，再加这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有事到中国去了，没有女主人在场的即使是便饭，也就格外落寞。

我和费正清是40年代的老友，自从1946年他回美后，我们已有四十多年没有见面，逢年过节的贺卡，也刚刚得到恢复，所以我失落在既熟悉又陌生的心情中。但是约翰（费正清的名字）除了头发更见稀疏外，却还是那副敦厚诚恳的样子；在眼镜的玻璃片后面，用深邃的眼光看着我们。

一见面他就道歉不会做饭，费慰梅不在，他只能献丑了。我说他这顿饭当然不能与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相比，但他已花了全力，他的诚心，我们完全欣赏。在餐桌上，他兴高采烈地说他现在已完全恢复名誉了。在麦卡锡时期，他是一个为中国共产党说话的特务嫌疑；在台湾，他们不客气地称